

《北美行》与中国文化学社：休斯顿岁月的文化印记

昌增益

收到何志工和王胜关于举办“休斯顿中国文化学术-《北美行》回顾聚会”的提议，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到三十多年前的美国休斯顿。那段穿梭于实验室与文化学社之间的岁月，那份油墨印刷的《北美行》所散发的独特气息，至今仍是我记忆深处珍藏的片段。尽管工作繁忙，我仍毫不犹豫地决定：这场跨越三十年的聚会，必须参加。

志工还提议大家撰写回忆文章，并将我1997年所写的《我与〈北美行〉的十年》发还给我。重读旧文，恍如隔世，许多细节已然模糊，但那份真挚的情感却依然温热。为准备这次写作，我特意翻出珍藏多年的《北美行》一个不完整的合订本——从1987年创刊号到1995年第22期。摩挲着泛黄的纸页，往事渐渐清晰。重读我在第15期发表的《留学生前途在中国》一文，其中写道：“冷静思考一下，与其在这边指手画脚（让洋人开心），倒不如卷起袖子回去干一场。实际的行动，即便是一小点也远胜过大堆的空谈。”又见第20期上发表的我的诗作《海外、游子、中秋》：

“太平洋不过一条小河
怎可把梦想阻隔
趁此浩然月色
我要轻轻跨过
海外今日你我
何日相聚在故国？”

这些文字让我再次看到了那个热情而坚定的年轻自己。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回国近三十载，我在祖国大地上实现了人生价值，见证了祖国的巨变，心中充满无限骄傲与自豪！

一、从“远帆”到编委：理科生的人文之旅

1985年，我通过教育部CUSBEA项目公派赴美，于贝勒医学院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彼时我的世界本该只有基因、蛋白质与实验数据，然而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86年——因旧病复发，我决定回国休养。临行前，德州医学中心的朋友们以诗赠别，那份深情令我触动，我遂以笔名“远帆”创作了《别离时分》一诗。此诗后发表于《北美行》第2期，成为我与这份刊物结缘的起点。

据我所知，刊物由何志工、徐海明和徐志华三位创办。其发刊词有言：“‘新大陆’光怪陆离，风光不与别处同，窥强探宝者云集于此，自不足为奇。此地人众地博，书文切磋乃至咏诵唱和便不可为少，此即《北美行》发刊之由。”《北美行》旨在记录留美学生的思想轨迹，反映其学习、生活风貌及求索中的痛苦、彷徨与欢欣。它是一个理性、探索与思考的园地，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坚持批评与怀疑精神，着眼于求索而非呐喊，属意于建造而非摧毁，它将始终与全体留美生携手，共谋中国之富足、民主与强大。

1987年我重返休斯顿继续学业，当主要精力再度投入生命科学时，《北美行》

与文化学社为我保留了一方珍贵的人文天地。至第6期，我的名字出现在了编委名单中。回想起来，这或许得益于我时任德州医学中心中国学者学生联谊会主席并主编联谊会通讯的经历。想来，是那些“公文”写作让学社的文友们发现，这个理科生心底还藏着一份对文字的爱。

二、薪火相传：《北美行》主编与文化学社社长沿革

这段历史虽已尘封，但通过旧刊资料与同仁回忆，其组织脉络仍可大致勾勒。

根据我手中保留的旧刊资料以及何志工先生提供的信息，我初步梳理出《北美行》历任主编的不完整名单如下：

创刊主编为何志工（笔名侯钟、何志恭，负责第1-5期），其后依次为：区结成（第6-7期，来自香港）、昌增益（第8-9期）、王少扬（第10-11期）、林汉明（第12-14期，亦来自香港）、钟文庆（第15期）、徐建勋（第16期）、范瑞平（第17-19期）、曾令同（第20期）、吴迪（第21、23-26期）、李经（第22期）、陈家杰（第27期）、程炼（第28-30期）、老路（第31-32期）、泰阁（第33期）、王建光（第34期）等。

值得注意的是，创刊号上未刊登任何编者信息，原因不详，但根据多方资料互证，可以确定主编为何志工。

在组织架构方面，《北美行》最初几期所标示的出版单位为“文化学社”。第6期刊登了关于中国文化学社及《北美行》改选的消息，并附有《中国文化学社章程》。根据刊物所载信息，中国文化学社的历任社长依次为何志工、范江弟、张志强（香港）、昌增益、夏虹、徐志华、陈武、王胜、邓明、柳飞舟、刘洪飞、贾在水等人。

需要说明的是，此名单主要依据1995年年底前的直接参与经历及早期资料整理而成。自我当时离开休斯顿回国任教后，对刊物及学社后续发展的了解均为间接获悉，因此名单在完整性与后期细节上可能存在局限。

三、思想的“百家讲坛”：跨越文理的文化沙龙

文化学社的魅力，远不止于纸面的名录更迭，更在于那些跨越文理界限的思想碰撞。在座谈会上，不同专业背景的学人——涵盖理科、工科、文学、管理、政治、历史等领域——齐聚一堂，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我们还有幸聆听了多位当地教授分享，包括来自休斯顿大学（后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的胡斑比教授（1945-2015），以及来自贝勒医学院（后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并改名为张东才）的张才教授。另一位积极参与者周本初博士（1935-2021）亦令我难忘，我了解到他曾因参与保卫钓鱼岛运动而受到美国政府排挤，此后回到大陆工作多年。而其中尤为令人钦佩的，是何志工博士学贯中西的博雅。他不仅深谙中国历史，更对美国历史有着精深的造诣——竟能在休斯顿大学为当地学子开设美国历史课程；我有幸亲聆授课，受益匪浅，其风范实为我辈楷模。

于我而言，这段经历无异于一座“业余大学”，让我从狭窄的生物学实验室，迈入了思想可以自由漫步的广阔原野。

如今回想，文化学社与《北美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生态系统。我们从手抄版起步（第1-4期），笔迹间还带着书写者的体温，繁简字体的并存无声诉说着成员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从第5期开始，我们进入电脑打印的现代化阶

段，但始终保持着思想的温度。

在此，我亦需特别追忆文化学社的老朋友华志安。这位伊朗裔美国友人（1964-2020），曾慷慨地将家作为学社的活动基地。他深爱中国，与我们情同家人。2000至2016年他在北京、上海工作期间，我们曾一同游览清华园与京城名胜，那些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们永远怀念他。

四、桥梁、摇篮与精神家园

1996年起，我在清华大学任教，2003年转入北京大学至今。虽然与《北美行》的物理距离渐远，但精神联系从未中断。如今回望，这段经历的意义愈发清晰。

首先，它堪称一座重要的文化桥梁。回溯信息相对闭塞的八九十年代，《北美行》为海外学人构建了一个思想交流的场域，既记录了我们在异国他乡的所见所行、所思所感，也成为了连接故土的精神纽带。通过它，我们排解乡愁，深入探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并理性比较不同政治体制的深层差异。

其次，它是一个人才摇篮。当年学社和刊物的同仁们，如今已遍布全球，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在休斯顿的这段“文艺副业”，锻炼了我们的组织能力、思辨能力和人文素养。这种文理兼修的熏陶，对我们日后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它是一种精神象征。那是在异国他乡自发组织起来，不求功利，只为文化认同与精神共鸣的理想主义情怀。《北美行》与文化学社，便是我们共同构筑的精神家园，它安放了游子的乡愁，滋养了思想的碰撞，也凝聚了超越专业界限的文化向心力。这种情怀，在任何时代都弥足珍贵。

结语

三十年后，我们即将在天津重聚。王胜做东，志工发起，大家执笔回忆——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接力。翻阅从第1期到第22期（另加第30期）的《北美行》，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休斯顿的夜晚，刚刚走出实验室的年轻自己，正匆匆赶往文化学社的座谈会，去赴一场思想与文学的约会。那段岁月告诉我：在成为科学家的道路上，我们首先应该成为一个丰富而完整的人。这些珍贵的文化印记，不仅记录了一代学人的成长历程，更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跨文化语境中始终坚守的精神追求与文化自信。

（2025年10月10日，于北京大学燕园）